

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 科学史 - 科学史总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与中国科学史研究——科学编史学意义上的理论可能性

作者简介: 章梅芳 刘兵*: [收稿日期]2004年9月10日; 修回2005年12月12日* [作者简介]: 章梅芳(1979—), 女, 安徽望江人,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刘兵(1958—), 辽宁海城人,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为科

文章来源: 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2期

加入时间: 2006-04-28

阅读次数: 997 次

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与中国科学史研究——科学编史学意义上的理论可能性

章梅芳 刘兵*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北京 100084)

摘要: 在科学史研究的不同阶段, 许多来自其他领域的思潮、学说和观点, 不断地影响到它的发展, 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的不同, 使得其不断以新的形式, 体现出新的视野、新的内容、新的解释和新的寓意, 科学史学科也因此而不断发展。在国际背景中, 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 都是近些年来颇有影响而且发展迅速的学术思潮, 在包括科学史在内的许多领域中表现出生命力。就中国科学史而言, 虽然已有少数相关研究, 但在国际范围的科学史领域中, 尚未成为学术主流。本文将从科学编史学的立场, 就这些思潮对于中国科学史研究可能带来的影响与意义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

关键词: 后殖民主义 女性主义 中国科学史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柯林伍德说过, 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不研究其次级的历史, 这里的次级历史指的是对该问题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1]站在科学编史学的立场, 反思科学史研究的过去, 分析和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与纲领, 对于促进科学史学科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一 引言

20世纪之前的西方科学史研究基本从属于科学家与哲学—历史学家两大阵营, 形成了相应的两大编史传统。这两类编史者基本上都不是职业的科学史家, 他们编写出的专科史和综合史, 都是实现各自领域某种目的一种手段, 没有形成独特的编史纲领。在编史方法上, 直到萨顿为止的这些编史学传统, 往往都以编年史研究为主导, [2]在编史观念或多或少受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实证主义哲学把科学史看成是一系列新发现的发现, 以及对既有观察材料的归纳总结过程, 是不断趋向真理和进步的历史。在这种哲学背景中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影响下的科学编史工作, 大多采用的是编年史方法, 把科学史看成是最新理论在过去渐次出现的大事年表。

20世纪30年代以来, 由亚历山大·柯瓦雷开创的“观念论”科学史研究传统开始在科学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编史传统强调科学的进步体现在科学理论与科学概念的进化上, 可以说是新康德主义哲学史方法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某种体现。与此同时, 另一种编史纲领也逐渐形成, 这种社会史的编史纲领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的影响, 强调把科学的发展置于复杂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更加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3], p.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后现代主义”和“社会

建构论”等思潮对西方科学史研究产生的影响也开始明显起来。

可见，西方科学史学史上的历次重大变化都受到了其他领域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影响，积极吸收这些新的观念和方法，促成了科学史学科的不断进步。目前我国科学史研究仍然以实证传统为主，研究方法大多限于历史文献的考据和分析。尽管实证传统今后仍然可能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主要编史纲领之一，但要促进科学史学科的全面发展，我们也必须及时、合理地吸收相关领域的新观念和新方法。近些年来，西方科学史研究开始引入了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展现出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对此，我们需要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 后殖民主义科学史及其启示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带有鲜明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是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新问题。[4]这一思潮是在对殖民主义的长期反省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有葛兰西、法农、福柯、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莫汉蒂和汤林森等。

后殖民主义思潮最初集中在文化领域，主要关注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文化殖民与语言殖民、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思潮开始影响到科学史研究，有关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科学在文化殖民中的作用与位置。虽然目前国内在文化研究等领域对后殖民主义的已形成了某种热点，但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中，有分量的相关的研究却依然不多见。

美国科学史家路易斯·佩尔森（Lewis Pyenson）将“殖民地科学”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从1982年开始，以“文化帝国主义与精密科学”为题，论述了德国、荷兰和法国的物理学、地球物理学、天文学与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佩尔森认为，西方人总是把自然的数学法则看成是文明的显著标志，把由资本家支持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摆在世界面前，以显示其文化人的姿态；而实际上，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牛顿原理等这样一些物理法则对于实际应用来说，并非唯一有效。例如，对于建造结实耐用的桥梁来说，牛顿原理的作用，如同哥白尼理论对于航海那样，都不那么必需。理论上的一致性并不等于实践上的一致性。但是，殖民地科学家的工作由于显示出对自然的操控能力而得到了殖民地居民的尊敬，他们的工作为欧洲的优越性提供了根据，他们通过抽象活动抑制了从属地区的独立情感。通过文本分析，佩尔森还揭示了法国殖民者的科学文化殖民策略：仅仅显示科学优势还不能完全抑制殖民地人们的自由思想，他们还必须被说服，解放的程度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自然提高的，任何东西也不能取代由科学带来的发展及其价值和意义。[5]

佩尔森的工作在科学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医学史家保罗·帕拉蒂诺（Paolo Palladino）和米切尔·沃伯斯

（Michael Worboys）在对他的工作进行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科学史研究。他们批判了佩尔森关于描述性科学和精密科学的划分，认为精密科学同样带有帝国主义色彩；批判了佩尔森把文化殖民主义单独抽离出来考察的做法，认为科学文化殖民与经济、政治殖民等是交织在一起的；批判佩尔森忽略了殖民地科学文化对于宗主国科学文化的影响，忽略了殖民地人群的视角，并在潜意识将科学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简单地看成是帝国科学向殖民地单向的流动等缺陷，强调西方科学与殖民地科学之间的互动关系。

[6]

此后，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是，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将其女性主义理论置于后殖民主义研究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中，坚持科学在文化上具有多元性这样一个基本立场，阐明了欧洲扩张与现代科学出现在欧洲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哈丁的工作中，充分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深层背景上的趋同。哈丁认为，后殖民时期的科学技术研究是从欧洲中心文化之外确立其关注和概念框架的，这一研究将运用包容性更广的科学定义，这一定义鼓励我们重新考察它何时是有用的、何时求助于一个更有限制性的定义代价太高。“科学”将被用来指称任何旨在系统地生产有关物质世界知识的活

动。在这种宽泛的科学定义下，所有的科学知识，包括近代西方确立起来的科学，都是所谓的“地方性知识”，或者“本土知识体系”。她认为，后殖民主义的科学技术研究的这种策略使得其能够探究不同文化的科技思想和实践的特色，它不仅可以为原有的概念框架添加新的研究主题，还能迫使概念框架本身发生变化。（[7], p.11）在这里，“本土知识”，或者说“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是一个及其重要核心概念，正是在对这个基本概念予以注重的基础上，我们才会推论出一系列重要可能结论。

后殖民主义科学史站在与传统科学史完全不同的立场上，从一种新的视角提出了诸多全新的见解。例如，在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中，往往只关注近现代欧洲的科学，那种“地方性的知识”只在人类学之类的领域中才被合法地研究；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立场则在多元文化的意义上，把“科学”的概念进行泛化，将各种“地方性知识”包容进来。后者的观念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来说，有很大的价值。

首先，涉及到的是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和“李约瑟难题”这两个问题曾一直困扰着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们，至今仍无定论。早自20世纪初，任鸿隽、竺可桢等老一辈科学史家就已讨论过前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些前辈们所指的科学，是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组织机构、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如果我们将科学定义在这个范畴，那么中国古代无疑是没有科学的。很多持“无”观点的学者也多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而持“有”的学者，往往更多的是从民族自尊心的立场来考虑，要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合法性的地位。因为如果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还哪来的科学史研究？然而，立足于后殖民主义科学史的立场，这一问题已经被消解了。因为在后殖民主义看来，与其他文化的系统知识传统一样，现代科学技术从若干重要方面看也属于地方性的知识体系，它们也产生过系统的无知模式。（[7], p.74）在这样一种观点下，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地位便毋庸置疑。既然普适的、唯一的、标准的科学体系是不存在的，近代西方科学也是地方性的科学体系，我们不需要拿它来作为参照对象，就可以找到自身的研究合法性。同样，“李约瑟难题”在此也可以得到解决。因为都是地方性知识，所以就不需去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的问题。正所谓“在当我们采取了新的、不将欧洲的近代科学作为参照标准，而是以一种非辉格式的立场，更关注非西方科学的本土与境及其意义，‘李约瑟问题’就不再成为一个必然的研究出发点，不再是采取这种立场的科学史家首要关心的核心问题了。” [8]

其次，从这一扩展的科学定义出发，后殖民主义的视野将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尤其是古代科学史研究开辟广阔的问题域。

由此所涉及到的，实质上是一个科学观的基本问题。原来被看作是民间信仰或巫术迷信（而在实际的分析中却可以看出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的那些知识，在这里也取得了被研究的合法性。例如，针灸学、草药学、古代妇科、女医等都得到与传统的数学、天文、物理等知识相类似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主流科学史也曾研究过燃素说、炼金术等内容，然而不同的是，它是把这些主流科学之外的内容作为与主流科学相关的背景来研究，而后殖民主义科学史却给予这些非主流的知识以独立的合法性地位。此外，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其研究方法十分多样丰富，大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这些具体的分析方法也可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所借鉴。

三 女性主义科学史及其启示

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从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中派生出了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它运用女性主义特有的观点和立场，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范围广泛的各门学科。（[3], pp88-89）其中，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源于与科学相关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使得学者们开始思考科学史上女性科学家如此之少的根本原因：究竟是女性出了问题，还是科学出了问题？科学在本质上是否与父权制相关？

为回答这些问题，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者一方面开始致力于寻找科学史中被忽略的重要女性科学家，恢复她们在科学史上的“席位”。这些研究既希望通过补充女性科学家的历史来完善既有的科学史，也试图确证不是女性出了问题，而是科学出了问题。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的学者转向批判科

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揭示近代科学的“父权制”根源。例如，女性主义学者卡洛林·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桑德拉·哈丁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揭示了科学从其历史起源开始，便具有性别建构的性质。[9]与此同时，很多女性主义学者注意到，这种被社会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形态建构的科学，反过来又进一步说明和强化着社会性别观念本身。他们通过研究自古希腊到20世纪的生物学史和医学史，充分说明了科学对性别差异和性别本质的建构和强化关系。例如，席宾格尔（Londa Schiebinger）、图安娜（Nancy Tuana）、欧德苏瑞（Nelly Oudshoorn）等就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揭示了科学与性别意识形态互相建构、互相强化的本质。[10]可见，正如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所认为的，批判性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不必将自身局限在科学中的女性主题上，而应该从各种角度深入分析科学中随处存在的父权制现象，[11]也正是这种批判性的分析视角，构成了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位置。使得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越来越成为西方科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颖而极具潜力的方面，越来越受到关注。[12]这里就这一新的编史观念之于中国科学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与价值做初步的理论分析。

第一，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给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新的问题域。

如同思想史编史传统的出现为科学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一样，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关注女性对科学所做的贡献，关注科学背后隐藏着的性别权力关系结构，关注科学事件对女性的影响，关注科学对女性本质的规定，关注与女性相关的“边缘”科学史等这些不能为以往科学史研究所注意到的内容。如果把女性主义视角纳入到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去，无疑将会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开辟广阔的问题域。

传统中国科学史研究对女性关注很少，有的学者可能认为，女性科技人物研究得少，不是因为他们不关注女性，而是因为她们本来就对科学贡献少，历史文献记载的也少。事实上，在近期学者对中国古代所有科技人物的生卒年资料进行搜集时，收编了上溯春秋时代，下迄民国末年，甚至少数延伸到20世纪50年代；空间上限于在中国出生和去世者，以致少数在外国去世者在内的中国古代科技人物；本着凡是能找到的妇女科技人物，全部收编的原则，最后在所收入的1522名人物之中，女性确实仅占19名。[13]然而，站在女性主义立场来看，这正说明了女性在科学史上的“集体失忆”，她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的科学工作被由男性掌控的历史文本所忽略和边缘化，她们没有话语权，没有历史记忆。为此，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除了要挖掘和恢复被以往科学史忽略的女性科学人物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既有科学历史文本中分析女性受压制、被忽略的原因，解构文本背后的性别权力关系。（[14], p.166）

以医学史为例，要研究中国古代女医问题，从女性主义编史学的视角出发，首先必须进行古代女医的发现、填补研究。然后还要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性别制度的规定及其在医学领域的体现、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实际运作与性别制度、观念的规范之间的差距、男医与女医的个人身份认同、医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与“女医形象”等问题，分析古代各种医学话语本身的非中立性、非客观性，重新思考古代医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假定等等，这些都是不可能在有性别盲点的科学史中被考虑到的内容。医学史的情况如此，其他学科史研究的情况也如此。

第二，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

尽管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内部流派纷呈、观点多样，但作为学术研究，它们共享一个基本的概念范畴，即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指的是，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一套强加于男女的不同看法和标准以及男女必须遵循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等，它区别于传统的生理性别（sex），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14],p.4）社会性别既是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其基本的分析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除了会发现传统科学史研究发现不了的新问题之外，还能对传统科学史已经研究或正在研究的问题，从新的分析方法和切入点入手，得出与前者不同的结论和评价。

笔者曾以第八届东亚国家科学史会议论文集集中的两篇医学史论文作为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两篇论文考察的都是中国古代女医问题，但由于采用的视角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和分析的深度也有所不同。[15]具体而言，其中一位学者通过对古代女医的医术技能、医学教育和医学地位等的分析认为：古代一些下层女医在医术和道德上都不行，杰出的男女医得到的尊敬一样。这些结论限于文献表面文字的搜集和总结，没有

对文献作者及其意图进行深入分析，对于中国古代记载女医的文献为何如此稀少的原因，也只是简单地从封建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迫角度稍做分析，因而结论也鲜有新意。[16]另外一位西方学者则从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揭示了古代男女医的社会地位并不平等，认为得到尊重的女医只是少数有家学背景的人；然后分析认为文献材料的男性作者们对女医的医术和道德进行了诋毁，并认为诋毁的背后掩藏着上层社会意识形态与男医共有的对女医的排斥立场和意图。此外，她还注意到了不同女医之间的差异，以及医学文化的多元化等问题。[17]这种不同的立场，特别是因有无社会性别意识以及对于医学的社会性别维度的认识的差异所导致的研究风格与结论的差异，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此外，女性主义对科学史进行研究所采用的具体分析方法包括隐喻分析、解释学方法和深度访谈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别于传统科学史研究的方法，值得借鉴。其中，隐喻分析是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关键方法。因为隐喻常常表达着人们对于事物的基本认知和评价方式，通过对科学中涉及到的性别隐喻进行分析，能揭示出科学史中的性别关系结构。

第三，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引起对传统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反思。

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与女性主义科学批判是紧密相关的，它们除了对传统科学史研究的视角、方法和内容等产生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支撑在其背后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传统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纯粹客观的、超乎社会之外的知识活动，它与

性别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内在关联，即使科学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现象，那也只是科学之外的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在科学领域的折射而已。建立在此科学观基础上的传统科学史研究，则把科学史看成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活动的历史，且这一历史有其独立的内在发展逻辑。女性主义科学观则认为，所谓价值中立、性别无涉的纯粹科学只不过是父权制文化从封建教会时期转向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一种观念上的人为建构，它并不具有建构者所认定和宣称的普遍性，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18]

可见，在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者看来，近代西方科学“进步”的历史是其与父权制意识形态相结合、加强的历史，传统的科学编史学将科学看成是脱离社会情境的、纯粹的、抽象的、价值中立的智力活动，因而无法揭示社会、经济、政治、性别等对科学的影响。也就是说，科学活动不仅与性别、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紧密相关，科学知识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的形成是负载了利益与价值取向的。随着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传统的引入，这种新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将会在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科学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内史”实证研究，而应该考虑到历史的具体情景及其与多种社会因素，尤其是与社会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

四 余论

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都是西方20世纪以来兴起的重要思潮，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白人男性心目中，妇女与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相似性。他（她）们都处在边缘、从属的位置，都被白人男性看作是异己的他者，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合力，二者之间展开了频繁的交流 and 对话。[19]

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它们都为传统科学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问题域，引入了新的分析视角与方法，对传统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因其主要关注第三世界的女性科学史，对于身处第三世界，具有性别研究盲点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来说，尤其需要引起关注。然而尽管如此，国内科学史界对这些新思潮持有的仍是或漠视或误解的态度，为此，有必要对一些问题给予澄清。

第一，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目的是不是狭隘的‘女性’目的，而是更强调以边缘人的视角对主导地位的科学建制进行批判、审视和重建。第二，研究女性主义科学史的学者不一定是女性。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同传统科学史研究一样，是男女主体都可从事的工作。第三，研究科学中的妇女不一定是女性主义科学史，没有直接关涉女性主题不一定就不是女性主义科学史，判断的标准在于社会性别视角和批判性分析维度的运

用。([14], pp.166-167)第四,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科学史研究不是完全否定西方近代科学, 而是要消解其普遍性与抽象性, 不是要以弱势边缘的“科学”取代它, 而是强调科学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共存与相互协调发展。第五, 研究殖民地的帝国科学机构和科学活动, 不一定是后殖民主义的科学史研究, 后者的关键在于对帝国科学文化的殖民化性质进行揭示与批判。第六, 采用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方法, 并不表示抛弃传统科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例如文献考证与分析等仍将是具体研究过程中重要方法。第七, 不是在西方可能过时的理论就不能引入和研究。有的学者认为, 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美国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受欢迎, 言下之意, 我们没必要去关注和研究。首先, 对某个思潮或流派的历史研究并不会因为其过时而停止; 其次, 在没有认真分析过这些对西方科学史研究产生深刻影响的新思潮之前, 就不假思索地将其弃置一旁, 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再次, 我们还可以提问: 在当下并不过时的思潮又是什么?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恐怕也远非易事。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对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 我们可以照搬来应用于我们的科学史研究。对于这些理论本身的缺陷和不足, 我们需要做冷静的分析, 要时刻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中国传统科学及科学观的特殊性, 充分考虑中西方在文化、民族、性别制度、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种种差异, 在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和特性, 立足于本国具体情境, 在避免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同时, 也谨防后殖民主义文化对我们形成的新的文化殖民。

参考文献:

- [1] [英]柯林伍德(陈静译): 柯林伍德自传(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24-125.
- [2] 吴国盛编: 科学思想史指南[C].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编者前言, 1997: 7.
- [3] 刘兵: 克丽奥眼中的科学[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6.
- [4] 王岳川: 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9.
- [5] Lewis Pyenson, Science and Imperialism [A], in R.C.Olby, et al. eds,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C], London: Routledge, 1990: 920-933.
- [6] Paolo Palladino and Michael Worboys, Science and Imperialism [J], Isis, 1993, (vol. 84):91-102.
- [7] [美]桑德拉·哈丁(夏侯炳、谭兆民译): 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 [8] 刘兵: 若干西方学者关于李约瑟工作的评述——兼论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的编史学问题[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3(1): 76.
- [9] 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0; Evelyn Fox Keller,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S.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0] Londa Schiebinger, Mind has no sex? : Women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Nancy Tuana, The Weaker Seed: The Sexist Bias of Reproductive Theory [A], in Nancy Tuana, ed. Feminism and Science[C],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Nelly Oudshoorn, Beyond the Natural Body: An Archaeology of Sex Hormones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11] Donna Jeanne. Haraway,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 [12] J. R. R. Christie, Femin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 in R.C.Olby, et al. eds,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C], London: Routledge, 1990: 107-108.
- [13] 李迪、查永平编: 中国历代科技人物生卒年表[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 [14] 刘兵、章梅芳: 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 [15] 章梅芳、刘兵: 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的意义——对两个相关科学史研究案例的比较研究[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5(2): 167-175.
- [16] ZHENG Jin-sheng, Female Medical Workers in Ancient China[A], in Yung Sik Kim and Francesca Bray, eds.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C],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99: 460-466.
- [17] Charlotte Furth, Women as Healers in the Ming Dynasty China[A], in Yung Sik Kim and Francesca Bray, eds.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C],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99:467-477.
- [18] 吴小英: 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76.
- [19] 罗钢、刘象愚主编: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前言,1999: 6-7.

Abstract

Postcolonialism, Femin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in Historiography

ZHANG Meifang LIU Bing

(STS Institu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During its different periods,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has different topics, and made the same topics ha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 New theories and perspective bring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with new form and new interpretation constantly. Very often, some idea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that came from other fields, have influenced history of science. For example, in recent years, 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text, and they have shown their vitality in many fields, including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scholars have noticed already these new theories'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however, related studies have not become mainstream in this field.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ossible influence and value of 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Key words: postcolonialism feminism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